

專訪港大商學院院長王于漸教授

小城市如何在知識經濟突圍

撰文：鄧崇銘

知識經濟不但帶來新的財富，同時亦帶來了新的財富分配問題。從個人而言，知識會否變成少數人專享的特權，其他人難以分享成果？互聯網普及能否打破知識壟斷？對地區來說，知識經濟又會否令少數大國佔盡優勢，其他國家難以競爭？

甚麼是知識經濟？打從人類的祖先懂得鑽木取火，已經開始利用知識謀求生計。從最廣義來說，知識經濟是指人類運用知識和創造力，透過特定社會組織形式，克服自然環境的限制，創造新的財富。時至今日，知識經濟的最主要特徵，則表現在互聯網、金融、知識等的全球普及和流通。

□ 難題一：私有產權 VS 普及效益

香港大學商學院院長王于漸教授指出，知識對人類歷史進步和經濟發展，無疑十分重要；但要將知識轉化為經濟動力及財富，卻絕非簡單的過程，涉及組織和制度的問題。難題之一是知識產權的保障。以往不少基礎知識如電力的應用，大大促進整體社會生產力的提升，但發明者卻並沒因此致富，原因是電力應用成為「純粹公共貨財」(pure public good)，新知識所帶來的財富，並未被私有化。

因此，要令知識產生財富，及為發明者提供誘因，首先就必須建立健全的知識產權制度。但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天，保障知識產權卻十分困難。可能辦法之一，是不讓新知識給其他

人知道，但如此知識的經濟效益亦難發揮。辦法之二，是發明者只公開部分知識，讓其他人知道其功用，但卻保留重要部分。辦法之三，則是專利制度，如此知識既可公開推廣，發明者亦可取得利益。

歸根結底，知識的私有產權及普及應用，難免構成重大矛盾：新知識愈普及，對社會的整體效益愈大，但對知識產權的保障程度卻愈低。

互聯網的普及，大大加快知識傳播的速度，獲得新知識的成本亦變得便宜，所產生滿溢效應（spillover effect）十分巨大。各種知識互相激盪，自由交流，又會產生更多意想不到的新知識。到底應保障發明者的利益，還是確保整體社會同時得益，王于漸認為，目前仍難有定論，這是目前知識經濟鮮為人提及、但十分值得思考的課題。

□ 難題二：細經濟體系要變通

當知識成為創造財富的重要泉源，並輕易跨越地域的限制，體積細小的經濟體系，處境亦較為不利。原因是本土市場太小，難以看到新知識的市場潛力，容易造成投資不足。以發展高科技產品為例，美國擁有龐大本土市場，有力支撐科研所需成本，便十分重要。

與此同時，知識經濟的一大特色，是人才要聚集在一起，互相切磋，才能產生匯聚效應，因此地方大人才多，群策群力才好辦事。至於細小的經濟體系，有限的人才不可能樣樣皆精，因此新知識出現的機會，可能性亦相對較低。小體積經濟體系求生存，就有需要靈活變通，不強求出產全球通用的「平台」（general platform），但卻可生產具地域特色的「內容」（specific content）。因此，要在知識經濟中突圍而出，王于漸認為，需要具備以下要素：

出路一：人才滙聚效應 (agglomeration effect)

他指出：「叻人和叻人走在一起，才會發揮最大的智力作用，這非一加一等於二的直綫關係，而是『三乘三』等於九的乘數效應。」因此最忌憚是平均主義的政策，令叻人無法集中一起。

互聯網的普及，無疑有助增加人才間的接觸(reach)，促進溝通，但顯然並不足夠。「最好是把叻人困在一間房裏，迫他們緊密互動(interact)，如此才能發揮最佳效果。」

出路二：關鍵群眾基礎 (critical mass)

除了要集中人才在一起，數量還要足夠的多，如此人才才能「既集中又不會過於集中」，彼此間能保持一定的差異，各有本身的特質和專長，如此才能互補不足，產生智力激盪，發揮最佳的互動效果。

出路三：打破框架 (de-compartmentalization)

新知識的出現，並沒有既定的規律，往往出於偶然的啟發。著名的例子是基因研究中 DNA 的雙螺旋狀結構，發現者最先是從砌積木得到啟發。因此，學科之間的條條框框必須打破，如此不同領域的知識，才能互相激盪啟發。

□ 香港突圍 靠傳統優勢

相信沒有人會懷疑，香港要大力邁向知識經濟；亦沒有人會懷疑，教育是知識經濟必要之鑰匙。問題在於，認清方向後，香港應如何實踐？知識經濟，是否仍遙不可及？

王于漸認為，知識經濟令具普遍功能的產品，得以行銷全球，產生巨大利潤。但世界各地的人民，基於文化背景的不同，口味始終存在差異。承載內容的「平台」(platform) 可席捲全球，但「內容」(content) 本身，卻必須配合不同地區的需求。

香港作為小體積經濟體系，欠缺知識經濟所需的規模效益，因此不能強求產出全球通用的新知識。因此生存之道，就是尋找市場的空隙，在地區層面突圍而出。要成功做到這點，就必須建基於香港既有的優勢。

香港的傳統優勢之一，是作為華人社會的文化中心，大眾文化產品如港產片、漫畫等，過去曾有突出的成就，雖然電影業目前陷於低潮，但累積的知識卻不容忽視。這些傳統經驗，用諸於發展新的產品如電腦遊戲、軟件設計，仍有望處於華人社會的領導地位。

此外，香港亦擁有中國、東南亞以至美國市場的豐富知識，佔有貿易及市場銷售等方面的優勢。這些對不同民族、不同市場的深入認識，同樣是香港的寶貴知識。知識雖然分散在不同人的身上，但若能夠透過有效的經濟組織和運作，集中和匯聚起來，同樣是知識經濟的重要資產。

□ 低技術勞工也要懂科技

至於政府的角色，則最重要是提供教育，這已是經濟學者的共識。王于漸認為，資源投入雖重要，但更重要是組織和制度的改進。平均主義的教育資源分配，對發展知識經濟最為不利，因為無法令優秀人才集中，發揮人才匯聚、智力激盪的效應。按此而言，香港教育無疑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。

王于漸又指出，即使是不太優秀的人才，其實同樣可在知識經濟中受惠，原因是互聯網減低學習障礙，資訊科技亦能助他們解決問題。不同人擁有的知識各異，學科間難言有高低之分，不能如傳統考試般，以分數多少來衡量。

但即使是低技術勞工，起碼要學習資訊科技，例如一般文員也需懂得操作電腦，因為這是基本的要求。至於教育成功的關鍵，是必須從小做起，而且愈早開始愈好。

□ 自由市場 最合知識經濟

雖然仍飽受經濟轉型的挑戰，但香港的自由市場制度，始終和知識經濟的要求最脛合。在控制過多的社會，知識難以自由流通，資源亦無法最有效分配，欠缺足夠的彈性和動力。王于漸認為，除提供教育和保障知識產權外，政府亦可透過表揚知識經濟中的「成功例子」，樹立社會的楷模，同樣可以達到傳播知識、推動發展的功效。

然而，假如由政府來決定經濟資源的分配，挑選而非獎勵「成功例子」，卻可能面對很大的風險。

王于漸指出，新加坡政府大力投資生物科技，那麼只能祝他們好運，因為新知識並非可以命令產生的，不能保證研究會有成果；即使有成果，還需面對商品化的過程。他們最終或許成功或許失敗，但亦不過是一種巧合而已。

□ 生產力躍進 未必創富

原來「新經濟」一詞並非近年出現。在過去三、四百年，就曾發生過三次「新經濟」的革命，包括十七世紀的農業革命、十九世紀末的電力及通訊革命，每次均標誌經濟結構的改變和生產力的躍進。

加州柏克萊大學經濟學教授 Bradford DeLong 指出，技術發展帶來生產力躍進，但「新經濟」卻並非太「新」。例如電燈的出現大大提高工廠的生產力，但「電燈革命」卻沒有出現，照明的開支大減，電燈製造商亦沒有發達。資訊科技革命帶來的「新經濟」又有多新？DeLong 認為，不應過早下定論，亦毋須太樂觀或太悲觀。生產力提升和經濟結構轉變，已是勢所必然，但經濟周期會否從此消失？卻不一定。

王于漸認為，DeLong 這篇名為「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New Economy」的文章，可讀性甚高，它轉載於「香港經濟研究所通訊」，二〇〇一年七月。

知識經濟由幼稚園開始

知識是不斷累積而成，新知識的出現，需要建基於舊有的知識基礎。因此基礎愈早打好，知識會帶來更多的新知識 (knowledge begets knowledge)。

上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芝加哥大學教授 James Heckman 認為，此一觀點對知識社會的教育及培訓政策，甚具啟示作用。

兒童愈早接受教育，其學習能力愈高，而且所得的知識受用時間愈長，有更大機會帶來新知識。

因此，教育資源首重投入於基礎教育，甚至是學前教育，包括幼年時的家庭教育。假如家庭無法負起責任，政府便應設法盡早介入。

王于漸則指出，社會不良風氣如嗲丸和狂野舞會文化，不但無益，從經濟角度而言，更侵奪了青少年的學習機會。

假如天資不高，再加上少年時失去學習機會，要後來追上便很困難，對社會將造成深遠影響。

(19/12/2001)